

疫情当下的人类社会和中美关系

许倬云

编者按：2020年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，整个世界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。似乎，人类文明又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口。政府强力干预和民间自力救济之下，中国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。世界其他地区随着疫情的蔓延陷入混乱，尤其是美国，截至2020年年底，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两千万。

九十岁的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，针对历史和当下的人类瘟疫、疫情中的美国大选、贸易摩擦下的中美关系及未来人类文明的可能性等重大问题，在美国匹兹堡家中，以《十日谈》为题发表了系列视频谈话。本文为许先生谈话摘要稿，经许倬云先生授权由本刊首发。

引言：混乱的世界，中国能否独善其身

中世纪的欧洲曾经暴发过大瘟疫，意大利作家乔万尼·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，就是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创作的。今天我们也正在面临大瘟疫的全球暴发，美国感染人数两千多万。恰好又碰上美国政治上的变化。美国正在暴发的瘟疫是世界性的，是生物性、病理性的，这个蔓延不容易制止。但更严重的，是文化上、社会性的集体疯狂。社会性的集体疯狂，是野心人士由于欲望和愚昧无知，结合产生了政治的“瘟疫”——执政者牢牢抓住权力不放。为了抓住权力，特朗普政府对外发起挑战，四面树敌；对内任性胡为，制造不安，罔顾行政混乱。如此社会性的大“瘟疫”，其严重性远比病理性瘟疫更惊人。美国政府如此施政会动摇美国国本，严重下

去将使得美国法律失效，更严重者会破坏美国立国的文化基础。如果不再有法律，人们也不再珍惜立国的文化基础，人将何以为人？一个如此美国，岂非人类历史的大悲剧？我们真的没有想到，这个可怕的现象居然出现了——美国居然有一半选民，会附和这样愚昧盲目冲动的政客，他居然能得到七八千万张选票。不少美国人民居然容忍他，倡言可以推翻已经执行二百余年的选举制度。我们当然可以诟病美国选举制度不完不备，留有漏洞，我们更要检讨的是：号称法治、民主、自由的美国文化，为什么在这些高尚的理念之下会出现这一“独夫”？为什么这么一个社会，这样一个国家，居然无法预防这样的政客出现？

二战结束后，美国耗尽兵力建设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，独霸全球，美国也耗尽财力建成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。可是，趾高气昂的美国

并不满足，它志在主宰全世界。美国的问题是在于成功带来了野心——这才是我们，都必须长存警惕之心的地方。

将来，我们将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合在一起看。中国能不能在世界混乱之中独善其身？能不能更进一步想想，如何帮助世界其他人种，大家共同缔造一个真正和平大同的社会？这个是我所盼望的。这不是一世一代能完成的，也不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百年能完成的，这要花很长久的时间。担下这任务，完成这任务，是我对中国的盼望。

我个人一生，生在中国长在外国。我所接受的教育，前半段在中国台湾地区，后半段在美国。我的研究生涯，几乎三分之二在美国，三分之一在中国台湾地区。看上去我是流离失所，但也因为这个“流离失所”，我对各个地方都有一些自己所观察到的问题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，我们面临的困难究竟关键在哪里？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我们应如何避免许多盲点？我们中国如何开拓一个康庄大道，逐渐提升到一个新境界？这也是我所关心的。

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瘟疫

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，中国政府对于瘟疫的记录已经形成制度，地方政府对于战争以及随之发生的大型灾害一定会记下来。可真正大规模暴发的瘟疫，记载比较多的是在公元二世纪后半段——大约公元170年到公元220年这半个世纪。这段时期的中国，几乎是瘟疫不断。

最大的瘟疫发生地区是禹州、青州、徐州，当年的东汉政权——也就是三国政权所在的区域，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。那个地带在东汉时期人口最繁密，农业非常发达。居住的环境相当拥挤，而且常常发生水灾。如果黄河、淮河发生水灾，某个地区一年里面就会有半年时间浸在水里面。这种浸水的地方，就是育养细菌最好的环境，当地就会因为潮湿的关系，时常发生疾病。

这一段有更重要的事件，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出现了。他是河南南阳人，家里两百多人的大族，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。所以他结合自己临床治

病的经验研究瘟疫，写了本书叫《伤寒杂病论》。这本书是具体、切实地从自己看到的经验，对疾病做分类、分析，并提出诊疗方案。这一段时间，中原地区死亡率是很高的。当时大概全中国人口有5000万上下，在瘟疫大规模暴发的区域大概有两三千万人口，因为这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。假如按照张仲景家族损失三分之二人口的比例来计算，这就相当可怕了。而且这种瘟疫是连年不断的，隔年城郭涂炭瘟疫都情况，跟农村几乎一样严重。农村固然因为医药环境相对差一点，但是面对瘟疫，城市里的人也没有很有效的办法应对。比如历史上的“建安七子”，当时有名的七个学问家，有四个死于传染病，可见其严重——这是公元217年发生的事情。

这段时间北方这么大规模的瘟疫，可以说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，而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村。在中国还是农业国家的时代，精耕细作农业，一方面取决于土地面积，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。假如一个家里有三个劳动力，两个大一个小，有一两个人在瘟疫中去世，这一家就等于失去了生产力。瘟疫暴发的中原一带，财富总量占全国1/3上下，这一带农业生产规模不够，经济状态也一定不行。瘟疫暴发影响农业生产的后果就是饥民激增，然后这些饥民投向流寇，投向各地地方武力，正好提供了三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兵员。同时，战争本身也会导致瘟疫产生，不仅是军队伤亡，许多死者堆着没人处理，也导致细菌繁殖。所以瘟疫的后果，第一是瘟疫集聚发生会导致人口快速减少，经济生产力减弱，社会秩序混乱；第二是瘟疫中养育的细菌会继续繁殖，甚至扩散到各处去。东汉末年的灾害，就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毁掉了。

大的瘟疫以后，尤其连续多年的瘟疫以后，会形成一个扰乱不安的现象：瘟疫——疾病——死亡。瘟疫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，死亡产生的尸首不能处理，病情没法处理，形成更大规模的恶性发展。最终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，其影响可达五六十年甚至一两百年。

东汉结束以后是魏晋时期的“五胡乱华”，等到南北朝以后，中国国内族群的分布已经跟汉朝的不一样了。少数民族进入中国，融入中国大的熔炉之中。他们慢慢汉化，在中国落户生根。隋朝的人口，以他们的本质基因而论，已经和汉晋时的人口不一样了。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，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严重的瘟疫。

除了这一次导致东汉帝国解体的大瘟疫，中国历史上还**暴发**过另外两次很严重的瘟疫。其中一次发生在元朝。成吉思汗从东北进入中国，一路向西打，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、领土最广阔的蒙古大帝国。从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，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蒙古人的海上力量也延伸得很远，当时阿拉伯国家和印度，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海上的活动，港口之间**往来不断**的船只、商旅，使得15世纪在欧洲**暴发**的黑死病变成全球性的瘟疫，从欧洲一直影响到中国。这次黑死病影响之大，甚至于欧洲的地图都因此产生了极大改变。瘟疫导致的欧洲人力不足，还逐渐造成以机器生产来代替人力劳动的**趋向**。

这场蒙古时代的大瘟疫，从15世纪一直绵延到16世纪。因为蒙古大帝国的存在，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。这个时候的黑死病是非常严重的疾病，在每个地方都造成极大的伤害。中国从有黑死病的出现，一直到明朝初年，蒙古帝国时期黑死病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。到明朝末年，海上的往来贸易，还把西方的黑死病带到中国东南和华南，尤其是华南地区。

上面讲的是这几次重大的灾害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。从全世界而言，大的瘟疫或大的流行病传播排起队来——黑死病、疟疾、天花、伤寒等等，到最近这些年的禽流感、新冠病毒，这一系列病毒都在国际贸易流通的背景下发生，使全球蒙受其害。

就黑死病而言，沙漠里面的老鼠携带病菌，沙漠商队走过，老鼠将其传播到人身上。商队随着贸易往来把黑死病的病菌传到各处。海路上的

情况亦复如此，黑死病若是在船上**暴发**，一条船进入欧洲港口时可能已经是空船——船员都已经死光了。

黑死病以及其他类似疾病，在近世以来造成的影响，不仅塑造了欧洲的面貌，也塑造了全球的面貌。假如没有海道上那么多的来往，那么多人携带的传染病，美洲不会被白人全面占领。白人进入美洲以后带来的天花以及性病——尤其是天花，由于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天花没有免疫力，短时间内人口从三五千万减少到三四百万。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死于战争，更多还是因为白人带来的病菌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死亡。这是一个改造世界面貌的大事件，对此后的世界产生了永远的影响。

其实，海路上受影响的不仅是美洲，许多岛国和沿海的口岸都感染了病毒，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几乎灭种。比如西班牙人进入了美洲加勒比海，加勒比海当地的原住民就几乎全死光了，这也是全球性的影响。

对中国来说，还有一次严重的瘟疫发生在明朝末年：这次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黑死病，通过南部的港口进入中国。这次瘟疫发生的时候，葡萄牙的传教士也把欧洲思想带进了中国。但明朝没有真正领受到西方新的思想的好处，也没有意识到西方人对自己的挑战可以是好的事情。反而这些人离开了，明朝政府就忘了他们所传播过来的知识、思想。面对外来思想和文明，明朝为何没能做出正确的反应？这里面缘故很多，大家知道明朝的独占性跟专制，使他们不主张、不喜欢臣下挑战国家权威与对皇权进行批判。这种独裁统治，使得新的思想无法进入，这是缘故之一。

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沿海地带，黑死病闹得很凶，有很多人还感染疟疾、吸血虫病等等。等于说，政府没有办法使全国人民安定。政府控制瘟疫的方法是烧因病毒致死者的尸体，结果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内乱。最后导致李自成、张献忠从陕北带着部队一路打到北京，政府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力。这一时期的中国遭受了极大的瘟疫，经济和生产力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。后来入关的满洲人，他们没有受

到疾病的影响，他们驱使着北方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中国投降的军队南下，大批的南方军队无力抵抗。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。

瘟疫发生的时空特性

现在我们要对几种瘟疫及其所存在的地域地理特性再加以讨论。中国及世界当前面临的瘟疫有两种来源，有一种是湿性的，就是水里边的病菌寄生、滋长，经过饮水侵入到了人的身体里面。沙门菌寄生在水里面，滋长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，就会侵犯到人体之内，造成无法挽救的疾病。而疟疾是靠蚊虫作为媒介，来传播病毒。蚊虫的寄生地，就是那些潮湿的地方。所以现在的伤寒、疟疾、痢疾，还有其他类似病，在中国本土就容易发生。

中国的淮水以南，基本上都有潮湿的问题，而且有很多湖泊、河流、山林。山林里面林森树密，也是非常潮湿。这一带还存在南方特有的血虫病，有的人在水里工作，吸血虫经过人的皮肤进入人体。还有麻风病，也是在温带，比较潮湿、带水的地方多发。我们看中国的大部分疆域，从中原以南都是这一类的自然条件。这种病菌很容易存活，在农村地区更容易广泛传播。

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，所以一直到近代，中国的居民百分之八九十还是生活在农村。农村生活的问题是，首先居住环境需要靠近水，灌溉用水、饮用水都要从河流、湖泊里面获取。在南方农村的水田里面，水长期蓄积在那里，不会因为蒸发变干。这种环境，对于细菌的培育是非常理想的。同样，有草有水的地方蚊子就多。树林子里边，潮湿的地方，有瘴气，容易感染疟疾也是这个道理。我们最早看到的瘟疫，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情况，跟温暖、潮湿的环境有关系。

瘟疫发生以后，到一定地步，出现人口大规模的死亡，常常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就此消失。逃荒的人从疫区逃出去，带着病菌一路跑，他们排泄、饮食种种，他们带着的病菌就留在当地的环境中尤其是水中。所以病毒传播的范围，往往跟水流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关系。此外，还跟沿着

大的道路的人口流动有关系。瘟疫往往在东西方向流通得很快，沿南北方向更容易发生变异。像汉末流行的这种伤寒瘟疫，它就是中国地带内生的。

还有一种瘟疫——鼠疫，也是全球大规模暴发的灾害。沙漠里面的老鼠，是传播鼠疫病毒的动物，这种瘟疫通常发生在干旱的地方。如果有大批的商队经过，感染鼠疫病毒后，他们就变成了病毒的传播渠道。病毒随商队从东往西、从西往东，这样在丝绸之路上来回流转。或者跟着大军作战、大部落移动传播。

还有一条瘟疫的传播途径，就是海港。沿海路从中国南部、东南部，进来了以后，病毒就跟着人口本来就密集的商路和港口传播，速度很快。瘟疫造成人口大量的死亡，生者大规模外逃。活人逃亡、死者未葬，造成了偏远地区的卫生环境恶化，因为病人乃至亡者尸首暴露在外，病源就很容易留下来。

靖康之变以后 100 年间，从金人侵入一直到元人夺得金人的首都，蒙古军队征服南方又征服西边。瘟疫的传播，也同蒙古大军、中国抵抗军队的移动都有关系。军队的移动本身很快，很多士兵不是死在疆场上，而是死在病床上。往往一万人出去，过了没多久就都死光了。这个耗损相当巨大，留下的灾害更长久，因为病菌也留下来。整体而言，13 世纪辽金元几次跟中国的冲突，尤其是蒙古的东西征讨，对中国的干旱地区的瘟疫传播，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连蒙古大汗蒙哥都因为感染瘟疫死在了前线。当时军队里的死亡率实际上非常惊人，往往达到了 90% 甚至更多。蒙古打四川的时候，四川人口减少了 90%。入侵者和本土居民双方都产生如此重大的伤亡，这是战争跟瘟疫一起造成的。

伤寒和鼠疫这两种形态的瘟疫，一个是在本土形成的，主要沿南北方向传播；一个是外来的，主要是沿东西方向传播；一个诞生于潮湿地区的脏水里、借由蚊虫传播，一个依赖于干旱地区的动物——沙漠里面的老鼠作为传播源。这两种瘟疫产生的影响，都旷日持久。100 多年间同一种瘟疫反复不断，实际上是一个病源的扩散、一个病源

的延续。

国家之间的战争、国家内部政权的转换，都伴随着征服战争、武装冲突，这里面因为疾病产生的伤亡，往往多于战争。可以说瘟疫从一开始出现，就具有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。社会性是因为疾病的**暴发**，人类原来的聚落可以完全被掀翻；政治性是国家本来稳定的秩序，因为瘟疫可以整个被倒过来，甚至导致灭国。

过金元一连串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国，到最后成立了大的蒙古帝国。为什么蒙古帝国不能够在南方长期生存下去？因为蒙古军队本身的损耗巨大，因为战争也因为瘟疫，到后来只能勉强在北边维持北元政权而已。到了明朝，南北的瘟疫混合在一起，连成大片大片的疫区。蒙古从中国退出去，也与此有关。蒙古觉得无法抵抗朱元璋的部队，因为他们北方一路感染了很多瘟疫。因为瘟疫传播的缘故，对于北方来的仇人、敌人，南方人更是坚决不让他们进来。元朝末年整个中国两元制的国体，就是南北对立的国体和瘟疫割裂下的国体。

疫情的暴发，助长了时代长期的不安

除了政治社会层面，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：疾病对于个体生命究竟还有什么其他影响？我个人觉得，有一个影响就是疾病导致的长时间的恐惧、惊慌、不安宁，使得人们生活作息受到影响，很多人离家逃亡，逃到安全区域甚至山里面。这种不安定，亲友故旧连连死亡的消息，满城都是棺槨的惨状，会使大家对于自己正在建立的世界产生怀疑。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组织、理解我们的社会？能不能在这种大灾难之中，寻找到未来发展的踪迹？具有信仰的人，会真诚地去告诉别人说：“你相信的事情不够用了。”东汉末年，是佛教输入中国最集中的时候。

蒙古时代输入中国最多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。但是伊斯兰教以及他们的观念并不能够在中国扎根，因为穆斯林人有种族限制。随之而来的，还有朴素的“再生”观念。所以到后来基督教进来，就很容易在北方被接受。元明两代，中国民间宗

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最大的后果就是明教及其以后的白莲教在民间扎根，秉持这种信仰的人数众多。今天中国民间宗教信仰里面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明教信仰的遗存。这种思想不断在寻找新的影响，寻找新的安生立命之所。来自民间的信仰塑造了他们所属的底层文化。

这次全球性的大瘟疫，美国国内的情况我可以预料——在这段时期，宗教活动一定会加强，也许是属灵教派有更大的影响，也许是其他新的宗教传入民间。这都是经济因素以外的底层变化。当然最大一个问题是，老百姓如果对政府不信任，就会造成内乱，以及产生推翻政府的想法，这个后果就是革命和改朝换代。所以瘟疫造成了思想上极大的冲击，而不仅是经济上极大的冲击。

我们目前正身处大型瘟疫的打击之中，其全球性的广泛传播出乎意料之外。全世界各地对瘟疫控制管束的能力水平不一，最令人诧异的是，本来应该最有效率的美国表现得最差，几乎到了手忙脚乱的地步。美国拥有的医药资源、卫生条件，都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灾害。也许这个瘟疫的发生，助长了这个时代已经存在的长期不安。

二战以后到现在，美国人悄悄地在发生转变。有一部分人检讨自己国内的情况，对内部制度、对外关系都有反思。有一些人遇到灾害，则不是采用这样的方式。比如美国的前任总统，行为鲁莽，做事嚣张，他把美国原有的管理机制打翻了，导致我们没法再很顺利地重建人和人之间、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信心，这是极大的灾害。

瘟疫带来的，是前所未有的压迫感

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好的阶段，接下来盛极而衰，就要经历一段灾难了——而且是一连串各种灾难同时到达。经历过灾难中的反省，人类社会又能往前进步。

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来都受瘟疫影响，全球各地的瘟疫报告天天列了表送到我们眼前。日常生活之中，人与人不再自由接触。商店关门、学校停课，工作单位允许工作人员在家里用远程的通讯设备在网上上班，甚至医生看病，都是在网上

问诊开处方。

这种情况确实给我们造成前所未有的压迫感。因为这个规模的疫情，因为每日每夜、时刻不能逃离的压迫感，使人们的紧张程度极为严重，不复原来的轻松自由。

这让我想起抗战时期的生活，因为日本军人的入侵，我们在内地各处不断迁徙、不断逃亡，那就是我对战争的印象。逃亡途中，就开始有人死亡。抗战前后的中国都有瘟疫，但是在战后蔓延更广，因为伤者未好死者未葬。在一次逃难途中，我们随着大队的难民路过一个村落，已经几乎全村无人。只有一个老太太在一个房子里，就跟我们说：你们自己想要过日子吗？我是村子里最后一个人了。你们不能随便喝水，我们都因为喝了水犯了瘟疫，现在全村人都死光了。于是我们这些逃避战争的人，在村子外面空旷地带扎营休息一夜，也不敢喝当地的水，只能想办法从树干里面吸出水来，从叶子里面吸出天然的水来解渴。瘟疫本身造成的影响，居然能让一个村子的人死绝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们看见老太太已经死了。我们没法替她埋葬尸体，只能朝她的尸首磕了头——我们也是自顾不暇。

这种瘟疫留下的印象、被死亡毁灭的印象，是我的亲身经历，那种恐惧感比今天大很多。在今天，我们只是感受到瘟疫导致的出行不便，以及媒体报道引起的恐慌，种种压迫感，被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、记忆之中。可是在真正无所投靠的情况下，眼看着一个村子的人几乎完全死亡，只剩一个老太太无望之中的希望，那种压迫感跟我们今天面临报道所感受的程度完全不一样。

瘟疫它造成的死亡并不是很快，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最严重的黑死病，也不是说几千万人染病后，在几天内就会死光。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，但它也是要好久才从起初的地方传到别处，一处一处、一城一城地毁灭人类。黑死病的传播有时候还是人为的。像蒙古军队往西攻击，对那些不肯投降的抵抗者，会拿已经死亡的尸首抛到城里去，将死亡的细菌全部放到城里。这些城里的人口很快染上瘟疫，整个城市的人口死光，他

们再驻扎进去。蒙古军队同样受到瘟疫的影响，很多士兵死亡。如同今天的美国政府管控不力，这种人为行动加速了瘟疫造成的死亡阴影，压在我们心上。

为什么美国疫情如此严重？

今天我们谈到瘟疫，常常有人叹息着中世纪的瘟疫，也是19世纪跨到20世纪之间的世界性瘟疫。今天我们看全世界各地的灾难曝光，确实非常同情。平心而论，如果将今天瘟疫暴发的情况与历史相比，我们无疑还是幸运者。我们能及时得到消息，有治愈的可能，能做更多的隔离、防护措施，可以减少生病，所以今天我们幸运多了。

我们分析今天的社会，今天的大社会是“interact”，是各种共同体互相连锁在一起。共同体中的一部分，比如说一个城市发生灾难，或者一个地区发生灾难，经过传播、经过隔离，互相联系、互相支援也可以，置身事外也可以，有着种种不同反应。互相照应的时候，会面临忽然让大家禁足的情况。就像中国的武汉，将城市封闭起来，封城减少了传播的效果。封城消息一来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干扰。这等于两个系统、两个共同体撞击在一起，两种不同的压力、吸引力的搅乱，造成新的混乱的波峰波底来回震荡。今天借用量子力学来分析，量子挣扎、量子扰乱（quantum mechanics entanglement），在当今社会信息流通很快、数量也很大。这种不同社区、不同共同体之间互相的纠缠，让信息回馈更加及时、频密，也造成许多的困扰和混乱。

但今天的瘟疫，为什么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有，医院、医护人员人口密度最高，医护设备也是最好的地区大规模暴发？为什么瘟疫在美国发生以后，居然有口罩不足、通风器材不足、检验设备不足等等问题呢？美国对疫情的反应，何以不如其他国家，何以病毒在美国传播率是全球最高，瘟疫感染总人数也是全世界最高，这就牵扯到人为问题了。特朗普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就是可以再度当选，

他的自我中心、自我膨胀造成了许多问题。他对于灾害的防控,相关资源的调动都没有好好安排。美国等于没有一个统一政府主导,没有各处互相协助、互相帮忙,反而各部门互相牵制、互相抵制,种种现实才造成如今美国极为奇怪的现象。最现代化、信息最能够迅速流通的美国,在全世界应付瘟疫的特殊情况之下,居然表现得如此之差。疫情导致全国政治机器停摆,导致政府该做的事情没做,各部门还互相纠缠、指责。

中美争端下的世界格局

接下来的问题,和现在的经济有关。最近20年,美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大恐慌。2001年的“安然事件”,是一个大的投资集团安然公司做假账,造成许多虚假的增长和亏空。这种假消息扰乱了市场,种种内幕被揭露以后,一时之间美国的经济几乎崩溃。另一次是2008年,美国暴发了“次贷危机”。虚假的信用被使用、反复抵押,实际情况与表象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,这种泡沫被戳破,形成了从美国开始波及全球的经济大恐慌。目前我们正在面对的,是一个不理性的政治领导者领导了美国的现实。对于正在大变化的全球经济,他不仅忘掉了应该做的事情,还忽视了全球的趋势、全球化的流通,看不到各区之间互通有无的需求。这种全球互通的情况,可以使资源流转加快,资金的周转也加快,工作机会多出数倍,使全球共存共荣。但是,美国通过提高关税来限制经济的流动,通过收关税“收回美国该得到的钱”。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,要跟其他的经济体对抗,他就毁掉了这个经济体。

举例来讲,日本在1990年左右,曾经是世界上非常强大的一个经济体。日本的店家在各地都能看见,日本的产品、日本的汽车满街都是。日本的产品,做得有品质价格又低廉。但是美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,因为日本经济的扩张威胁到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。美国人花了30年的时间,把日本的经济打垮。用信用贷款压榨日本,不允许日本利用美国的金融结构来资助日本上市企业,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。

全球一体化、经济共同化,以全球共同市场以及区域经济合作、免税体系这两个观念来说,现在的美国把这两个已经建制得有成效的制度、合作模式都废掉了,以至于信息都不许自由流通。美国想退出世界卫生组织,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跟大家分享,也看不起别人给的信息。这是上届美国政府的无理取闹,不同经济体之间本来可以顺畅互动、合作、共赢,却变成错误的纠缠、荒谬的纠缠,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因此,瘟疫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共同体,进而言之又因为另外一个客体跟他又相关了——中美要走经济上的对抗之战。

这几年来,中国经济崛起已然是现实。美国做惯了霸主,忽然中国开始以高速度的发展,威胁到了美国第一位的位置。我们看过去世界的历史,比如希腊城邦争霸的时候,霸主不容许第二号强国出现挑战他们。西方历史上一个强国嫉妒后来的挑战者,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第二号强国打下去——希腊消灭了来自边缘地区的挑战者,罗马毁掉了旁边的迦太基。希腊城邦没有想到的是,当自己建立希腊帝国的时候,边缘不是城邦的那些部落起来了,马其顿起来了。以至于后来,教会的组织笼罩全球的时候,各种蛮族入侵后被基督教收编,同样是因为一个霸主不允许第二个霸主出现。这都是过去频频发生的常例。

法国强大的时候要把英国拉下来,英国强大的时候把西班牙的海军打败。德国强大的时候,西方、西欧的集团要把它打垮掉。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空洞洞的中欧集团的组织,并不能调解这种互相冲击列国的体制。

美国从英国手上夺下来这个霸主政权,是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后果。英国遭遇危险,两次都得到了美国帮助。虽然英国最终得到胜利,将日耳曼民族的霸主权全部夺过来,然而,三百年建立的大英帝国霸权,曾经日不落帝国的荣耀,也必须让给美国。

美国经济霸权的建立,第一步是否定了欧洲货币的地位;第二步是建立了黄金货币标准——金本位;第三步是打破金本位,变为一篮子货币

做标准的合作制度。终于，美国把美金变成世界货币的标准，这是美国世界经济制度成为霸权很重要的表现。美国力量受到外部挑战的时候，它必须将挑战者打下去。德国、法国以欧盟的方式被绑在欧洲不能动，日本也被打下去了。现在就是美国认为必须将中国打下来，仍要处于一个长期独霸的状态。

美国做庄家，却不愿意担任领导者的责任。这是独霸的思想，没办法长期维持下去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，又超越了经济制度、经济发展，延伸到所谓意识形态、组织方式，延伸到所谓各国的立国信仰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立国信仰，另外一个国家需要模仿呢？甚至认为自己的信仰就是最好的支柱呢？“最好的支柱”永远是不断变动调整的，没有“最好的支柱”永久存在。为什么不能大家慢慢摸索，共同寻找适合于自己——也是未来发展可能性之一的支柱，大家各自寻找、一起合作呢？这是美国的霸权思想造成的结果，他们不能容忍不一样的思想、制度存在。

疫情的全球暴发使我觉得，不管世界经济能不能真的实现一体化，信息的流通对于大家而言已休戚相关。应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，离不开大家彼此的扶持。世界永远在变化，永远不变的是“变化”本身。中国的《易经》说：“易者，易也，不易也。”“改变”是“最不会改变”的现象，我们必须一路尝试摸索。

带头的国家必须要付出若干代价，也必须站出来承担责任，这是无法逃避的天地的大责任。要让老二、老三信任支持你，老大就要任劳任怨，要担起责任、要担起负担。不幸的是，在美国这个经济大帝国，也是政治大帝国，由于政治力量、武装力量撑住了它经济的结构，不能明白、接受“变化”的道理和现实。这个最后的霸主，如果不能理解地球是“转”的——人在转、地球也在转、信息也在转，就不容易处理不断到来的挑战。而世界走到今天，还是就这么大一个世界，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用到地球以外的资源作为我们求生的资本。没做到以前，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互相合作、互相共存。这个讯息我希望我们中国人也了解。

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说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我也不勉强你，但是你也把你的原则硬加在所有国家之上。各个国家容忍彼此的差异互相包容，这才是世界共存之道。

作者：许倬云，江苏无锡人，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。1930年生于厦门，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，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、美国匹兹堡大学，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、美国夏威夷大学、美国杜克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。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，学术代表作有《西周史》《汉代农业》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《求古编》等。近三十年来，许先生致力于为大众写史，有《万古江河》《说中国》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，海内外行销百万册。其中，《万古江河》获第三届“天津奖”。

责任编辑：钟晓媚